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 2015 年第 5 期

近代西欧国家建设中的代表制^{*}

李 剑

-
- [内容提要] 当代政治学关于国家建设的研究多从国家权力的集中、理性官僚制构造等自上而下的视角出发,大多忽略了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另一维度即代表制的生成与演化。代表制是中世纪到近代欧洲政治史的重要线索,其间也经历了从等级代表制到代议制的关键转型。早期等级代表制是欧洲封建时代中后期多元政治力量平衡的结果,而近世成长为代议制则体现了现代国家社会整合的需要。西欧国家建设的经验表明,完善的强代表制是造就具备高效治理能力强国家的关键柱石。
- [关键词] 国家建设 代表制 代议制 等级代表
-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15)05-0140-07
-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15.05.020

国家建设是晚近人类政治发展的主题。许多亚非拉地区的国家仍在国家建设的轨道上苦苦挣扎,而即使所谓一些先发国家在时空变幻的情境下也难以回避制度发展的新压力。国家建设与其说存在一个明确固定的终点,倒不如看做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价值体系、地缘格局乃至生态环境等因素都不断为其铺陈出迥异的背景,牵引其发展方向。林尚立指出,“现代国家组织形态不是基于血缘的或地缘的自然关系纽带而形成的,而是基于特定的制度性安排而形成的,其出发点就是:通过一套制度体制将

一定区域的人民整合为一个能够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①正因此,现代国家建设本质上是国家制度建构,与中西方政治文明历史累积、开创的种种制度形态有关。

一、集权与代表:国家建设研究的视角转向

对于现代国家建设这一主题,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依据韦伯的定义,“国家”只有到了近代才获得充分的发展,其形态特征是:暴力垄断、理性化官僚制、明确的领土边界。^②韦伯对现代国家基

^{*} 本文系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当代国家治理理论新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4C011)及厦门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本特征的概括,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研究者的理论思路。

埃利亚斯将现代国家描绘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器”^③。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社会中职能分工的细化,不同职能间相互依存程度提高的同时,人际关系也表现出公开或隐蔽的矛盾性,更具体的表现则是利益的四分五裂。要遏制这一离心趋势,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化的治理机制。中央领主先是扩展占有土地,然后通过税收的独占建立常备军,进而完成对暴力的独占。当统治阶级的暴力垄断和赋税垄断巩固了其对于土地的垄断之时,方能言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接下来,从国王的家族或宫廷中发展出了全新的行政管理机构,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辅助王权的独占和资源汲取。^④无论是绝对专制主义国家还是后来的民主国家,国家的权力独占机制实际上不断在延续和强化。

查尔斯·蒂利将战争视为国家构建的主要动力,以资本和强制为主要分析变量,阐述了现代国家创建过程中统治者如何通过这两个变量的不同组合方式来实现统治目的,从而在欧洲形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变体。最终,“军事力量成了民族政府的强有力的专门化部门,财政活动和军事活动有组织的分离增强了……国家承担了范围大大扩展了的分配的、常规的、补偿的和裁决的活动”^⑤。国家的监控、治理能力因此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吉登斯则提出“权力集装箱”这一形象的概念,视民族国家为现时代最强大高效的权力集装箱。“只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机器才能成功地实现垄断暴力工具的要求,而且也只有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家机器的行政控制范围才能与这种要求所需的领土边界直接对应起来”^⑥。“只有伴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中央集权的国家行政权力机构才得以普遍存在。”^⑦

国家建设的理论先驱们尽管旨趣有别、方法各异,甚至集中讨论的历史阶段都不尽相同,但是就其论述中心而言,似乎都有相似的线索。埃特曼审视前贤们的研究时说到,“这些学者都倾向于把一种现代早期的政权与一种国家基础结构联系起来——绝对主义与官僚制、宪政主义与官僚制的相对稀缺。”^⑧

现代国家异于以往的各种政治形态之处确乎在于其权力的垄断性和集中性。但对于中央集权和官僚制的过渡渲染,可能会导致对西方现代国家建设历程的片面简略,对现代国家建设过程多元性、复杂性的轻描淡写,可能会营造一种略偏颇的认知:国家建设主要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官僚化,进而轻视和忽略其他制度形式在西方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迈克尔·曼曾提出一个极有启示性的分析概念——基础性权力。他认为,基础性权力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制度能力,是一个“双向车道”,在扩展了国家渗透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市民社会控制国家的能力得到提升。^⑨从现代国家制度发展的广泛性来看,多数关于国家构建的研究基本上遵循自上而下的、集权的视角;然而,从另一种分权型的、自下而上的角度切入,应当仍具有意义。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其中一种特定的制度——代表制。后面的部分将在探索代表制本身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讨论其对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反思代表制的不同发展道路如何影响现代国家政权的特质以及不同国家的政治能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兴衰。

二、早期代表制与等级制国家

“代表”是人类生活中家喻户晓的政治现象,“代表”一词充斥着现代政治生活。皮特金《代表的概念》一书的问世,使之更明确地开辟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领域,激发出纷繁多样的学术讨论。政治词源学的考证告诉我们,古希腊并无与代表对应的词汇,“代表”(representation)发源于古拉丁语“repraesentare”,而其初义是文学、艺术、图像上的再现,并无人际关系的意涵,更与侧重于权力关系的所谓现代“政治代表”无关。直到13、14世纪,“代表”方才浮现其现代意义,但还是没有附带选举、民主等属性。17、18世纪,“代表”才开始被用来指称民众的代表者。在此,本文聚焦于这样一些问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代表制从何而生?所指为何?其间蕴含着什么样的政治与社会逻辑?

“代表制的思想比代议制政府的思想存在更久,也更为普遍。”^⑩塞缪尔·芬纳发现,13、14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大量会议机构,这些会议机构有两个特征:一是“它们全都是由代表们所组成的政

治聚会,这些代表们依照特权规则,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行事”;二是它们均为常设性机构,而非封建时代咨议会那样的临时性安排。代表及其常设会议机构的存在,赋予了政治权力运作前所未有的特征。尽管此种制度安排尚无现代代议制里大众参与、政党竞争、议会主权等要素,但是芬纳称之为“中世纪伟大的政治发明”。^⑪

与代表大会相应的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模式。和封建主义的高度权力分割相比,这种政治模式体现出某种统治集中化的趋向,但又因其政治权力为多个社会团体所共享,并服务于团体利益。这一政治形态处于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的历史间隙,被称之为“等级制国家”。^⑫“在等级制国家中,有势力的个人或团体频繁地聚合成各种以合法形式设立的代表制会议,并与统治者或其代表打交道,发表他们的声明,重申他们的权利,系统地陈述他们的建议,确定他们与统治者合作的条件,并承担他们分享的统治责任。”^⑬

等级会议的主体显然大都是经济、社会或政治上有能力的或有特权的阶层。其中有地方贵族、城镇居民、教区、行业,等等。等级会议更类似一种群体性、团体性的代表模式,很难称得上是“人民代表机构”,人们常常称等级会议成员为“邦国的代表”或“民族的代表”。就资格而论,参与等级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政治地位形成的自然特权。严海兵认为,“等级代表体制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只有经济上独立的家长才能够参与公共生活。这种参与的权利不是来源于他们作为全国性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是来源于他们对领土和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他们从属于由法律界定的功能性团体(比如贵族、教会或商人或手工业者协会)的身份。因此,挑选出来参加公共生活的人是某一团体的代表,而不是个人的代表。”^⑭

以等级会议为表现形式的“古典代表制”既笼罩着欧洲封建主义时代的阴影,又具有数个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累积效应。芬纳指出,封建体制军事意义的衰退与消失和诸种地域性、功能性社团的形成是封建时代终结的标识,也是“古典代表制”形成的背景。^⑮

寻求军事动员与领地安全被认为是西欧封建关系确立的重要原因,而与领主—附庸相应的法

律地位及军事责任制度便是封建体制的核心。君主将土地授予骑士,换取了军事服务的承诺,骑士—贵族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衍生为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上的优越性。从12世纪开始,君主们开始尝试用现金报酬的形式取代个人军事服务(如免除兵役税),以提高军事动员的效率。此后贵族们对君主承担的封建军事义务宣告结束,土地日益被作为向君主缴纳特定税费的个人财产。然而,战争军备费用的急剧攀升令传统的封建收入入不敷出,扩征税收成为“代表大会”的动力之一。“一旦国王必须如此,他就会处在这些被请求者的控制之下。”^⑯

在中世纪末期,欧洲社会已经分化为无数的地域与功能性社团。教会和贵族阶层自不待言,市民阶层也已开始崛起。恩格斯说,“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都不得不团结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⑰市民阶级凭借财富积累的规模与速度,逐渐强大到令教士与贵族相形见绌。富有的市民阶级已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征税常常是等级代表会议召开的主要动机。新兴的市民阶级显然是君王财政饥渴的重要对象,也逐渐开始成为等级会议中的重要一员,“王侯们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将市民召来参加高级教士和贵族会议,同他们共商大事”^⑱。

虽然名称各异、构成形式有别,但是在13、14世纪,代表制几乎遍布欧洲的王国和公国。佛朗索瓦·基佐对此不吝溢美之词。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不承认持续凌驾于全体公民之上的专制权力的合法性,任何时候,它都要追求永远制约着现有权力的理性、正义和真理。……这样做的方式是:辩论、公开性、舆论自由。”^⑲政治的现实即便难以与基佐的自由主义理想形态严丝合缝,但客观上早期代表制对于王权形成的约束也难以否认。

然而,“在法国、西班牙和俄罗斯,这些团体没能凝聚成强大的制度化参与者,没能对抗中央国家,没能取得宪政上的妥协,没能获得国王对自己的负责。相比之下,英国议会却是强大而凝聚

的”^{②1} 福山的话道出了早期代表制在不同国家的异样命运。唯有英国以其强韧的延续性,历经内战与政争的风雨洗礼,在中世纪的等级会议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代议制。

在埃特曼看来,英国中世纪末期到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模式可称之为“官僚宪政主义”。在初生的官僚体系基础上,代表制度的发展完善抑制了如包税制、世袭制、职务私有化的固化,推进了更有效、更负责任的行政管理及财政模式的建立,实现了代表性、效率、责任的结构性平衡,支持着英国军事与商业此后的成功。^{②2}当匈牙利、波兰的代表机关沦为贵族特权的工具(世袭宪政主义),法、德的代表机构在世袭绝对主义与官僚绝对主义的阴影下趋于衰落,英国代表制的成就仍然值得回味。

三、从“等级代表”到“代议制”:代表制的现代变迁

皮特金指出,“无论代表的概念还是代表的制度,都与选举或民主并无必然关联。”^{②3}早期的代表制与现代人所熟知的“代议制”或代议民主制之间,尚横亘着诸多观念与物象的鸿沟。“代表制”跨越这一历史分水岭的历程也见证了国家建构时空的斗转星移。

如前所述,等级会议是一种具有排他性、封闭性及精英色彩的组织形态。“各不同的阶级是彼此完全独立的,各郡骑士不会向公民发难,公民也不为难各郡骑士;彼此也不参与对方的选举……那些在下等的、不牢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贫穷的农夫不包括在这些阶级之中。”^{②4}森口繁治指出,英国式的等级会议与现代议会的主要区别在于:(1)等级会议的成员所代表的不是公民个人,而是某一阶层或团体,投票权是从属于某一阶层或团体的特权身份的象征,下层阶级一般没有自己的代表;(2)在等级代表制度下,议员与其从属的阶级或团体之间,存在着委任的关系,议员根据委任状而获得权限,现代的议员和其选民之间则没有这样的关系;(3)现代的议会每年开会,议员的任期一般也以法律来规定,而等级会议是不定期的会议,由国王根据问题需要而召集,其开会场所也不定;(4)与现代议会的权能复杂相比,等级会议的权限主要只有两条:一是对于国王课税的

同意,二是向国王提交陈情表,提出政策建议和要求;(5)等级会议的投票计算不依议员的人数,而以各选举区为单位,同一选区议员的投票必须保持一致,否则视为无效;(6)等级会议代表的费用来源也与现代完全不同,现代议员的职务是公务,其参会的费用由国库支出,而在彼时,该项费用则由各选举区负担。^{②5}

丛日云也提及,在一个等级社会尚不能产生人人具有平等政治权利的观念。个人不是共同体的基础,代表的基础是社团,如等级、领地、教会、教区、城市、修道院(或修会)、行会等,而不是个人。代表的选举、代表机构的构成和议事程序也不是以平等的代表权为基础。每个代表并不平等地代表同等规模的团体,大量非自由民则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国王与议会中的非民选部分(贵族和高级僧侣)和民选部分共同构成议会,民选议会只是部分地参与国家的立法和决策过程,国王和贵族享有政治特权;在议事程序上,数量原则与质量(等级差别)原则并存,单纯的数量原则无论是在议员的选举还是在议会的议事程序中都只是部分地应用。^{②6}可见,要转型为现代代议制,等级会议还需要完成功能与性质上的转变。

以英国为开端,18、19世纪的西欧出现了此起彼伏的向代议制民主转型的潮流。“无代表不纳税”某种程度上是这一转型机理的形象说明。“革命的年代”既有断裂式起伏不定的制度复兴与重构,也有延续性星火燎原的制度演进。在英国,等级会议慢慢发展成了更具开放性的议会,在“光荣革命”之后甚至取代君主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而随着工业革命以来民众参与意识的觉醒,选举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经过了历次胶着的改革,选举议会的权利也在社会各阶层中慢慢扩展。^{②7}下层阶级的抗争明确指向了传统的代表体制。底层阶级相信,借由选举权去影响议会,有助于实现个体与阶层的利益。“工人领袖们认为争取政治权利是消灭贫困的途径,视争取男子普选权、参政权作为工人维护自身经济权利的有效手段。哈尼说‘我们要求普选权,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②8}

在法国,已被搁置100多年的三级会议因政权的财政危机重新召开。贵族精英们试图用传统的等级代表制来对抗王权,却同时给了第三等级

走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三级会议与王权的对抗引发法国政治史经久不息的动荡局面。仅从选举资格的设置上,在1789到拿破仑建立帝国的十数年间,法国便经历了八次选举资格的调整,选举权的定义起伏不定,到1845年,选民人数仅有24.1万人。^②以选举权、代表权为重要内容的公民抗争跨越了整个19世纪,甚至一度激发出了巴黎公社这样富于社会主义代议制色彩的政治形式。^③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德国的代议制发展模式也值得一提。一战结束前,德国的政体在任何意义上都很难称之为民主,但就代议制发展而论,在某些方面,德国并不落后于欧洲各国。“在投票权扩大之前,统一之前的德国在地域上并存着几种相互竞争的代议制规则:既定的等级制选举的传统概念,统一的国家代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拿破仑的公民投票式大众民主的观念,以及罗马天主教的功能性代表模式。”^④1848年革命中,创设新型的自由主义式议会体制成为主要的革命诉求。^⑤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议会亦成为显要的组成部分,享有一定的财政预算和立法权威。跛足的议会以广泛的成年男子普选产生。这一格局甚至得到恩格斯的高度关注,主张可以将其作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⑥。

代表制向代议制转型的主要表现是:一是代表机构成为国家权力中心;二是代表机构代表性的延伸,即议会从代表特权阶层的机构逐渐演变为代表全体人民的机构。而其中心环节是选举权的扩展。在选举权扩展方式上,体现出了两种策略。一种是以1848年的法国和此后的丹麦、挪威为代表,它们采用了激进的方式,急剧扩展享有选举权的主体;另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通过法律逐步扩展选举权。在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不断扩大的同时,除了选票价值不平等、选区代表性差异等问题逐步被解决外,“一人一票、同票同值”的原则也开始成为选举的基本原则。^⑦

个人为基本单位、更完善的选举程序、民主的

价值内涵等要素汇聚,塑造了今天所称“代议制”的政治模式。密尔相信,代议制政府要求公民选举自己的代表在议会中行使公民委托的权力,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限制权力腐败与实现公共幸福的有力工具。^⑧马克思、恩格斯则信奉直接或参与民主的形式,提出代议机关行使一切权力,人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成员并对其加以监督,并且视代议民主为一场骗局。^⑨如果仅立足于制度本身形式而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纷争,其实也是对于不同代表形式优劣的辩论。

代议制为何会成为近代以来欧洲国家政治变革的一大主题?在政治思想史的视域里,特别对民主理论家而言,这是民主、平等价值观深入人心后的政治后果,而对代议制的推崇反映的则是民主价值观在现代实践中的反思调和,或者是直接民主在现代大国的实践困难,或是认为代议民主可以过滤托克维尔所谓民主化时代的恶质。更实证派的研究则强调了经济发展、经济结构演化、文化变迁、教育水平等经验要素的影响。

对此,韦伯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解释思路,即现代国家社会整合的需要。韦伯说“平等的数字选举到处都在取得长足进展,从纯政治角度看,这并非单纯的偶合,因为平等投票权的机械性质与当代国家的基本性质是一致的。现代国家第一次有了国家公民的概念。平等选举权最初仅仅意味着,在社会生活的这个环节上,个人这次不是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根据他所特有的职业地位或家庭地位被看待,也不是根据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差异被看待,而是直截了当地被看做一个公民。这意味着国民的政治统一,而不是隔离不同生活领域的分界线。……如果从纯粹民族政治的角度考虑,平等选举权的正面依据在于这一事实:它与现代国家本身所产生的某些命运的平等密切相关。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给予接受了官僚统治的人民以最低限度的共同决策权去决定他们有义务为之献出生命的共同体的各项事务。”^⑩

韦伯并非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拥趸,他所关注的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会以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来支撑其大国雄心。韦伯对代议机制的推崇,着眼于德国国家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家的培育问题。他谈道“要么,公民大众在一个徒

具议会制统治外表的官僚制威权国家中丧失自由或权利,像一群家养牲畜一般被置于行政管理之下,要么,公民作为共同统治者被整合进国家之中。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主宰者民族将别无选择。”^{②③}如此一来,看上去代议民主其实更像是现代社会一个既满足大众寻求认可的需要,又一定程度上将大众隔绝于政治之外的有用道具。所以,韦伯说“当年的君主们,在时机到来之际,对自己的权力施加限制,让国会代议制发达,其行事不仅高贵之极,并且也明智之极。”^③

当迈克尔·曼判定争取代议制政府的斗争是“自觉的国家”必不可少的选择时,揭示出某种形式的代表制并非讨论现代国家建设时的题外话。

四、结语:强国家与强代表之间

循着霍布斯的理论逻辑,在荆棘丛生、危机四伏的政治“丛林”中,秩序与安全的必需性似乎注定了“强大国家”是国家建设的必然选择。“全能主义国家”理论不过是为提供了更为生动细致的经验证明。而当代国家政治发展的黯淡现实,甚至触动了福山这样的新保守主义者对于“国家建设”议题的全新反思。种种关于后发国家采取何种国家建设战略的叙述,以某种时序命题提供了“强国家”优先性的新理论基础,并足以得出有力的推论:如无强大成熟统一的国家官僚行政机器为骨干,代表制的现代形式——代议民主更易成为党争与社会分裂的温床、寡头政治的渊藪。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国家之异于传统政治体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角色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传统政治体——王国或帝国,或多以强制性制度维系,或者依托于种族、文化同质性之上的天然认同,换言之,传统政治体更像是自然共同体。与之相比,现代国家的“人为”色彩更浓厚。此“人为”的意义是作为自觉主体的个体或集团角色开始冲破先天的自然与文化限定,政治体具有了可选择性。就此而论,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想型“民族国家”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建构,是精英或政治力量拣选历史要素加以组合、加以想象的结果(想象的共同体)。现代人不仅选择政体,甚至开始选择归属,故而认同的力量才会在现代世界扩展。另一方面,所谓“全球化”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流动性增加的过程。这便为选择

提供了更多价值、制度、生活方式的参照系,也给国家施加了更多的治理压力,需要为更挑剔、也可挑剔的个体供给更良善的制度生存空间。赫希曼的“退出、呼吁、忠诚”模式也只有在这样的基本背景下方才成立。

据此背景限制再来看近来讨论热烈的“强国家”问题。传统的“强国家”观念将关注点多集中于国家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控制与资源汲取能力,却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来自社会的忠诚与认同维度;问题的另一面则如米格达尔所言,“现代国家成败的关键,特别是它赢得人民服从的能力,在于国家与被统治者关系的性质。”^④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作出了类似的表述“国家能力概念涵盖又超越了政府的行政与技术能力。它还包涵了给予政治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灵活性、规则及约束,从而使之能依循公共利益而行动的深层制度机制。”^⑤按照韦伯的论述,赋予社会力量更多参与权的代表制本身对于现代国家建设的意义便不言而喻了。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国家在其国家制度完善过程中,自上而下的集权治理体系同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度都成为一种必备设施,虽然其制度形态和运作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纵然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与西方自由民主的模式迥异,依照经典作家的理想预设与政治现实,特定代表制形式的改良与完善也是政治发展和学术思考的重要议题。

人们若能细致观察并思考欧洲各国政治发展进程的成败得失,进而注意到代表制在近代欧洲的转化过程,当不会轻易无视代表制所具有的政治价值。这种价值并非完全是要被民主标签所绑定,也可以国家建设的视角加以理解,从而牵引出一种可资借鉴的政治逻辑“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恰恰从一开始就与许多强有力的参与式组织相结合,从长远看,这最可以让国家政权平衡基础结构扩展、政治参与、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需求。”^⑥

注释:

①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设的政治逻辑》,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②③[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第313页。

④⑤[德]诺贝特·埃利亚斯著《文明的进程》第2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8页,第400—402页。

⑤[美]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3页。

⑥⑦[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页,第121页。

⑧⑨⑩[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3页,第182—246页,第379页。

⑪[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二卷(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71页。

⑫[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4页。

⑬⑭⑮[英]塞缪尔·E. 芬纳《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页,第445页,第446页。

⑯[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40页。

⑰[美]贾恩弗朗哥·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页。

⑱⑲严海兵《选举与国家认同》,载于《学海》2012年第4期。

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9页。

㉑[比]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0页。

㉒⑳[法]弗朗索瓦·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页,第350页。

㉓⑳[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

㉔⑳[美]汉娜·皮特金《代表的概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3页。

㉕丛日云、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载于《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㉖⑳[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㉗⑳沈汉、刘新成《英国议会政治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㉘⑳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60页。

㉙⑳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㉚⑳严海兵《选举与民主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㉛⑳[加]马丁·基钦《剑桥插图德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80页。

㉜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卷第545页。

㉝⑳何俊志《选举政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㉞⑳参见[英]约翰·S. 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㉟⑳[英]保罗·金斯伯格《民主:危机与新生》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㊱㊲⑳[德]马克斯·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5—87页,第106页。

㊳⑳乔尔·S. 米格代尔《国家研究》,载于马克·I. 利希巴赫、阿兰·朱克曼编《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㊴⑳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7.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责任编辑:文思]